



陇右文化研究丛书

主 编 雍际春 副主编 霍志军

TIANSHUI FANGMATAN MUBAN
DITU YANJIU LUNJI



 天水放马滩木板
地图研究论集

 雍际春 字鹏旭 ◆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究丛书

主 编 雍际春 副主编 霍志军

TIANSHUI FANGMATAN MUBAN
DITU YANJIU LUNJI



天水放马滩木板 地图研究论集

雍际春 李鹏旭◆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论集/雍际春, 李鹏旭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
(陇右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203-0991-2

I. ①天… II. ①雍… ②李… III. ①历史地图—
中国—秦代—文集 IV. ①K992.6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474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31.5
插页 2
字数 366 千字
定价 1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1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
——陇右文化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陇右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及主编名单

编委会主任 田 澍

编委会委员 侯甬坚 张德芳 薛正昌

吴 毅 陈逸平 雍际春

丛书主编 雍际春

丛书副主编 霍志军

总 序

大千世界，万象竞呈。因区域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在中国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彰显着各地人们的文化气质。燕赵、齐鲁、巴蜀、三秦、荆楚、吴越等文化已广为人知。这其中，陇右文化更是因其所处的农牧交错、华戎交汇与南北过渡的区位优势，成为我国地域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的一朵奇葩，具有迷人的风采，散发着瑰丽的芬芳。

陇右文化源远流长。若从原始人类遗迹来看，从陇东华池县赵家岔、辛家沟和泾川大岭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 3.8 万年的“武山人”遗迹的发现，已昭示着陇右远古文化的曙光即将来临。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天水地区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等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早期遗存，翻开了陇右文化源头的第一页。继之而起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文化类型，在多样化农业起源与牧业起源，中国最早的彩陶与地画、文字刻画符号、宫殿式建筑、水泥的发现，最早的冶金术和铜刀、铜镜与金器的出

土，礼仪中心的出现，表明等级身份的特殊器具玉器的发现，贫富分化与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的出现等，这一系列与文明起源相关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成就，既为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提供了佐证、增添了异彩，也是黄河上游地区开始迈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齐家文化之后的夏商之际，西戎氐羌部族广泛活动于陇右地区，并与中原农耕文化保持频繁的接触与交流，开创了农耕与草原文化相互介入、渗透和交融创新的文明模式。与此同时，周人起于陇东，秦人西迁并兴起于天水，陇右成为周秦早期文化的诞生地，并奠定了陇右以华戎交汇、农牧结合为特征的第一抹文化底色。自秦汉至明清，陇右地区民族交融不断，中西交流不绝，在悠久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兼容并蓄、多元互补、尚武刚毅、生生不息的地域文化特质。这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元素，成为华夏文化中最具活力的基因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夏文明的传承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在国内各地域文化研究如火如荼、成果层出不穷，地域文化与旅游开发日益升温的形势下，陇右文化的研究却相对冷寂，只是近年来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其中，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人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2001年，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学校陇右文化研究爱好者共同的努力下，国内唯一的陇右地域文化研究学术机构——陇右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中心以开放的管理方式，以学校内部的学术力量为基础，广泛联系省内外的科研院所和相关文博专家，同气相求，共同承担起陇右文化学术研究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重任。以期中心的研究成果庶几能为甘肃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中心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12个春秋。12年里，我校的陇右文

化研究与学科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一是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初步构建了陇右文化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为陇右文化研究和知识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催生和形成了一个省级重点学科，将科研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使陇右文化研究工作可持续发展有了基础保障。三是2010年中心被确定为甘肃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陇右文化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搭建了平台。四是会聚和成长起一支既充满活力又富有潜力的学术研究队伍。五是通过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长期开办“陇右文化研究”名牌栏目，编印《陇右文化论丛》连续出版物和出版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丛书”，为研究和宣传陇右文化营造了一块探索交流的学术阵地。在此基础上，产生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在推进学科建设，服务甘肃文化大省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0年，学校为了进一步加大对陇右文化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的扶持力度，将陇右文化重点学科建设作为重大项目，申报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专项经费并得到资助，这为陇右文化研究基地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费保障。由此我们的研究条件大为改善，先后启动了项目研究、著作出版和资料购置等计划。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陇右文化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即是著作出版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深知，陇右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但许多领域的研究几近空白，基础研究工作亟待加强。所以，对于“丛书”的编写，我们秉持创新的理念，科学的精神，求实的态度，提倡作者以陇右地域文化为研究范围，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特长，自拟选题自由探讨。只要有所创新，成一家之言，不限题材和篇幅，经申报评审获得立项后，即可入编“丛书”。

经过各位作者一年多的辛勤努力和创造性劳动，按计划“丛书”已基本完成。入编“丛书”的著作，涉及陇右文化研究的各方面，主要包括始祖文化、关陇文化、陇右文学、杜甫陇右诗、陇右旅游文化、陇右石窟艺术、陇右史地、陇右方言和放马滩木板地图等主题。各书的作者均是从事陇右文化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骨干，其中既有多年从事陇右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也有近年来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才俊。因此，“丛书”的出版，无疑是我校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最新进展与成果的一次整体亮相；也必将对深化陇右文化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深知学海无涯，探索永无止境，“丛书”所展示的成果也只是作者在陇右文化研究探索道路上的阶段性总结，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与不足。作为引玉之砖，我们希望并欢迎学界同人和读者多提批评、指导意见，激励我们做得更好，以推动陇右文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丛书”出版之际，正值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启动实施之时。这一发展战略确定了围绕“一带”、建设“三区”、打造“十三板块”（简称“1313工程”）的工作布局。“一带”是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三区”是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和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十三板块”即13类文化发展与资源保护和开发工作，分别是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利用，民族文化遗产，古籍整理出版，红色文化弘扬，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品牌打造，文化队伍建设和节庆赛事会展举办。这一战略以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平台，对加快甘肃文化大省建设，探索

一条在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实现科学发展的新路子，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及其实施重点，也就是我们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的主旨所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服务社会是高校所肩负的神圣职责。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的实施，为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契机，也为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学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充分利用陇右文化研究基地这一平台，发挥人才和学术优势，积极参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为甘肃省文化大省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建言献策、奉献智慧。我们相信，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无疑会在这一战略实施中大显身手，发挥排头兵的作用；也必将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的实施中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学科生长点。

祝愿本套丛书的出版为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增光添彩！

雍际春

2013年春于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近年来关于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雍际春	1
近二十年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综述 / 雍际春 李鹏旭	15
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 发掘 /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	27
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 / 何双全	48
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 / 何双全	67
《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质疑 / 刘信芳	81
放马滩出土竹简日书刍议 / 任步云	87
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 / 李学勤	100
天水秦简《墓主记》试探 / 陈长琦	110
放马滩秦简乙 360—366 号“墓主记”说商榷 / 孙占宇	123
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 / 张修桂	132
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绘制者与 年代问题新探 / 雍际春 陈逸平	141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论集

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 / 曹婉如	154
放马滩战国秦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 / 朱玲玲	172
两千三百多年前的《放马滩地图》 / 张修桂	186
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	
——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 / 张修桂	198
战国时秦的领域形成和交通路线 / [日]藤田胜久 著 李淑萍 译	239
对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几点新认识 / 祝中熹	286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版式组合与地图复原新探 / 雍际春 党安荣	307
放马滩木板地图的组并、释解及反映的史实 / 潘守正	321
天水放马滩秦国木板地图刍议 / 刘 劲	345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新释 / 屈卡乐	351
新出土秦板图汉帛图汇考 / 马先醒	371
放马滩秦墓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比较 / 曹婉如	390
“下具地理”与秦汉地图 / 郭宝发	406
论天水放马滩秦墓地图中的“邽丘”非指邽县 / 岳维宗	425
“邽丘”辨	
——读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简图》札记 / 徐日辉	428
邽丘、上邽县地望考辨 / 雍际春	443
天水放马滩地图注记及其内容初探 / 雍际春	465
放马滩秦地图林业交通史料研究 / 王子今 李 斯	479
后 记	491

近年来关于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雍际春

1986年3月，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林业局党川林场职工在放马滩护林站修建房屋时，发现古墓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派专人前往进行钻探和发掘，证实当地是一片秦汉古墓群，共有墓葬100余座，总面积1100多平方米。当时发掘了14座（编号为86TBDFM 1-14），其中秦墓13座，汉墓1座。共出土文物400余件，主要有战国秦木板地图、竹简、纸绘地图、木版画、文具、算筹、钱币及陶、漆、木、铜器等，其中尤以木板与纸绘地图最为珍贵。墓地地下水丰富，木板地图等文物沉浸在墓椁底部泥水之中长达两千余年，出土后经避光、避高温、避风裂和脱水等技术处理，两年后，木板完全脱水，使地图完整地重现于世。《文物天地》1988年第6期刊登了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和韩仲民《谈木板地图》两文；《文物》1989年第2期刊登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全面介绍了墓葬与木板地图等文物的基本情况；1989年7月10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天水放马滩出土七幅木板地图”为题做了重点报道。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发现，是继长

沙马王堆汉墓地图出土之后，我国乃至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实物地图。因此，消息和资料一公布，立即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不少学者纷纷撰文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现将近年来关于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做一回顾和概述。

一 关于地图的作者问题

放马滩木板地图出土于一号墓，地图的作者是谁？其身份与经历如何？是研究和认定地图绘制年代与地图绘制地域范围的关键和前提。一号墓中出土的 460 枚竹简，按内容被分为《日书》和《墓主记》两部分。《墓主记》为认定地图的作者提供了珍贵资料 and 重要线索。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 年第 2 期）一文认为，地图的作者就是一号墓墓主，这位墓主名叫丹，因伤人犯罪而受刑，被弃市，三年后复活。对此，学者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关于地图作者丹的身份，观点并不一致。何双全等认为墓主生前是一位军人，曾参加过战役，后因杀人犯罪而受刑，很可能因此被流放于放马滩，墓主原来可能是邽县的一个基层官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何双全执笔，《文物》1989 年第 2 期）。李学勤不同意上述观点，他在《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 年第 4 期）一文中，通过对竹简文字校释后认为，墓主丹是战国时魏国大梁人，为魏将犀武的舍人。秦昭王十七年（前 300），丹在韩地垣雍犯了刺伤人的罪自刺而死并被弃市。复活后随司命史“北击赵氏”（即赵国），自垣雍北行，过上党，由赵国西行经秦国上郡，最后到北地，至少居住四年以后南迁至陇西郡的氐道。张修桂（《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复旦学报》1991 年第 1 期）进一步研究后认为，地图作者墓主丹不是一位军人，而是一位弄墨的文人，因为在其墓中出土的 30 余件文物，多为与地图有关的文具、木尺、算筹和竹简《日书》等，而没有

一件是兵器。表明墓主生前爱好文化典籍，故“墓主丹应是文化圈内的地理学者，他不但精通天文、地理，而且能测绘制作地图，在当时无疑是一位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因而，他的随军也只能是充当谋士之类的文职人员。秦国因发动伐赵取义渠戎战役的需要，考虑到他丰富的地理知识和社会地位，所以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伐赵凯旋之后，墓主丹或因有功而改牢刑为流放，或因不愿回归曾被“弃市”的故里，最后驻守邽县东南要塞燔史关至死并葬于该关北侧公共墓地——今日之放马滩。张修桂还推测丹伤人时年龄约 30 岁，则终年为 49 岁左右。

二 关于地图的绘制年代问题

关于地图的绘制年代，论者均主要以放马滩竹简乙组《墓主记》中的记载为据，但因竹简发掘时已经散乱，并有断缺，加之对个别字的识读也有分歧，故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

何双全依据简文：“八年八月己巳，邽丞赤敢谒御史，九畷人王里、樊野曰丹[于]邽守：七年，丹矢伤人垣离里，中面，自刺矣。弃之于市，三日，葬之垣离南门外，三年，丹而复生……”认为从简文纪年以及随葬品的特征分析，地图绘制的年代为秦始皇八年，即公元前 239 年。朱玲玲《放马滩战国秦图与先秦的地图学》一文亦主此说（《郑州大学学报》1992 年第 1 期）。任步云的《放马滩出土竹简日书刍议》（《西北史地》1989 年第 3 期）一文，则从“邽守”“邽丞”等职官名称及其演变入手，认为竹简不记建元纪年，则《日书》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 239）至汉高帝八年（前 199）或文帝八年（前 172）之间。李学勤在校释简文的基础上，对简文时间与地图绘制年代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认为简文“八年八月己巳”应为“卅八年八月己巳”。从该墓的地理位置和出土器物看，系战国末至秦代的秦墓，在这段时间内，秦君只有昭王一人有三十八年，秦昭王三十八年相当于公元前 269 年，颛顼历八月丁巳朔，己巳为十三日。简文有

“今七年”，与此三十八年属于同王。丹在七年刺伤人，被弃市后掩埋，三年后复活，又过四年而有闻能食，这加在一起已到十四年，所以简文开头历朔不可能是八年。同时，秦昭王八年即公元前 299 年，秦王政八年即公元前 239 年，八月均无己巳日。其间孝文、庄襄两王又没有八年，八年自可排除。李学勤还从地名与政区设置、丹与魏将犀武的关系、职官以及秦、魏两国在当时的战事等方面印证了这一结论（《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

张修桂《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版）一文，经过详细论证认为，何双全将《墓主记》中的“三年……北击赵氏”一语判定为秦始皇父庄襄王三年，进而断定《墓主记》开头“八年”为秦始皇八年的结论是错误的。理由是若肯定“三年”为庄襄王三年，则丹伤人的“七年”所指为哪一帝王的纪年就无法落实。从《墓主记》行文的上下次序分析，丹是在某位秦王七年伤人自刺，三年后复生，故伐赵事件应是某秦王的第十年，而战国时代各秦王有七年与十年纪年的有十位，但在十年伐赵的只有秦惠文王后元十年（前 315）。至于《墓主记》开头的“八年”应是丹的死期，这显然已不是秦惠文王后元八年，也不可能是丹从征 76 年后的秦始皇八年。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有“八年”纪年的秦王，只有秦昭襄王一人，故墓主丹终年的“八年”，无疑是他从征赵国 16 年之后的秦昭襄王八年。但秦昭襄王八年八月没有己巳日，他不赞同李学勤主张的“卅八年”说，认为“己巳”应为“己丑”。昭襄王八年为公元前 299 年，颛顼历八年壬午朔，“八月己丑”即为八月初八。因此，地图的绘制年代，必然是在秦昭襄王之前的公元前 300 年以前。张修桂还进一步将放马滩七幅木板地图分为两组，根据墓主丹的生平与活动，认为编号为 3、6、7、8 号的地图构成第二图组，是丹在伐赵之后，在守燔史关的 12 年中所绘，其绘制时间可断定在公元前 305 年前后的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前 310）至秦昭襄王八年（前 299）这一具体

时段之内；而由编号为1、2号地图组成的第一图组，绘制时间应早于第二图组，以地图所示地区、精度、实际使用过等五个方面证明，该图组作于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前318）之前，当在公元前320年前后的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前324）至七年之间。

三 关于地图反映的政区与内容

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出土，为研究战国时期秦国邦县地区，即今天水地区的行政建置及其早期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此，学者们的认识是共同的。但由于地图所绘地区不大，属小区域图，且图上地名大都与今名不同，古籍中亦少见到，加之有些字迹和图的局部已模糊不清，从而给确定该图所示区域造成一定困难，导致学者们对七幅地图间的关系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和解释。

（一）关于七幅地图的编缀

对于出土的七幅地图中的六幅成品地图，到目前有截然不同的三种组合。何双全最早就六幅地图进行了编缀组合。他的研究表明，图3可定方位，图4可知比例，图1是以“邦丘”为中心的行政区域图。图3重点描绘了以亭形建筑标记为中心的一带地形；由图1、3、9构成了一块大面积图，属以邦丘为主体的天水地区西半部地图；图4、5、8可拼为一图，以图5、8为主体，构成了邦丘行政区域的东半部地图。这东、西两半部图可以相接，构成一幅全图（《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

何双全对放马滩地图六幅成品图的编缀，为其他学者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所得结论有不少被其他学者否定。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一文认为，图1、2、7相互之间关系密切，是一组；图3、4、6是另一组。这两组地图中，图1是一幅总图，其他五幅均为分图，或称局部图。